

元代藏传佛教之关公信仰

赵晓斐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关羽, 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 以其为主体的关公文化从南北朝开始出现, 在唐朝形成, 经历宋元而后兴盛, 期间少数民族对其传播起着巨大作用。之后在高僧与统治阶级的支持下, 关公信仰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佛教对关羽的神化、利用、影响及其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得关公信仰由荆州地区推向了全国。

关键词: 关羽; 关公文化; 佛教关公; 元代国家信仰

关公文化指关羽为代表的骁勇善战、忠义果敢、恪信守义, 体现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传统英雄形象的文化。关羽, 字云长, 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开国元勋, 其人生极具英雄主义色彩。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 其文化信仰却是死后才开始出现。

一、关公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关公文化的形成在于两个方面, 一为统治阶级需要的英勇将士形象; 二为百姓信奉的守护神形象。从三国到南北朝, 三百多年的大动荡时期, 关公文化应运而生。关公文化开始于荆州地区, 关羽虽为解州人, 因其驻守荆州的历史原因有关, 其事迹多出于荆州。关公文化的开始得益于曹操、孙权的厚葬。《三国志注》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220年), “权送羽首于曹公, 以诸侯礼葬其尸骸。”关羽作为刘备的左膀右臂, 关羽的死, 孙权是对刘备有所忌惮的, 而曹操对关羽是出于敬佩之情。作为英雄形象的关羽被厚葬, 对当时人民的心理作用产生影响, 这种社会心理的引导, 是关公文化的开始。因此缘故, 荆州的士人百姓对于关羽的崇拜提高至勇士的标准, 而荆州的少数民族随着迁徙将关公信仰带至南方更远的地方传播, 使关公文化开始形成。关公文化在南方的传播还要归功于夷人的文化信仰, 春秋战国遗留的楚人在思想文化上本就尚武。从楚大夫屈原的《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怨。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中可体会楚人尚武的精神。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谈勇必提项羽, 楚人对关羽的崇拜实属合理。唐代时, 戎州属于蜀地, 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结合历史事件“引僚入蜀”可知戎州的少数民族有一部分是原荆州迁徙而来。因此, 关公文化在唐时期的南方也迅速形成。宋代以降, 关公文化开始在北方汉地盛行。

二、宗教信仰下的关公文化

佛教中的关公信仰, 其渊源应从天台宗的玉泉山显灵开始。隋开皇十二年(593年), 天台宗四祖智者大师来玉泉山创立精舍。智者大师, 著名高僧选取关羽作为显灵对象原因在于荆州地界关公文化的流行, 便于其传播外来宗教的教义。而且智者大师从小生活在荆州, 对关公文化并不陌生, 选取关羽形象作为显灵对象最为合适。天台宗, 作为中国本土佛教宗派, 其教义中吸收很多道教思想, 关羽作为神将护法的身分引入佛教, 到南宋时正式成为佛教中的伽蓝菩萨, 有《慈相寺关帝庙记》碑刻记载“大定十三载(1173年)……公曰今兹天下伽蓝奉此者为护法之神”。在此之前被尊为“坛越”, 桂林龙隐岩题刻中“坛越关三郎”, 即“施主”之意。关公信仰在佛教中的传播密宗也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为不空大师宣扬的毗沙门天王被关公信仰取代, 使得关公信仰在完备的毗沙门信仰基础上大肆传播, 结果是关庙越来越多, 北天王庙越来越少, 直至取代。关

公信仰取代毗沙门天王这一成就离不开八思巴上师的影响,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 深得忽必烈的喜爱, 管理西藏事务。同时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 忽必烈听从八思巴的建议, 以关羽为法师监坛, 举行盛大活动, 此规制延续到元时期末才结束, 关公信仰与藏传佛教产生紧密的联系。

三、国家信仰中的关公文化

元代文献中所见与关羽信仰有关之史料不多, 学界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元史》有载自世祖以后, 每岁二月十五日启建白伞盖佛事, 在整个过程中需周游皇城内外, 其中关羽被用作监坛, 完全说明元帝国统治者对关羽的尊崇程度很高, 但此记载所言可能是与藏传佛教相关。泰定三年(1323年), 在阿鲁威所写的《义勇武安王碑》中, 关羽的称号已达到八十八字, 可见其地位影响。而在天历元年(1329年), 元文宗对关羽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显灵”二字可见与佛教文化下的玉泉山显灵有直接关系。元代奉藏传佛教为国教, 最初的用意在于把它作为沟通西藏关系, 作为收复边远居民的手段, 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之后在八思巴的影响下, 元代统治者越来越喜爱藏传佛教。元代地域辽阔, 蒙古统治者对各宗教流派也是包容万象。期间推动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部分汉民地区的传播。在大一统的国家内, 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汉等各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上有八思巴帝师的推广, 下有藏区少数民族对英雄格萨尔的热爱, (格萨尔常被藏区人误认为是关圣帝君), 使得关公文化开始兴盛。学者加央平措对关羽信仰在藏区的发展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他指出关帝信仰被引入藏区以后, 首先由高僧活佛吸纳为藏传佛教护法神, 继而被藏民以格萨尔形象供奉, 最后在高僧智者与能工巧匠打造下实现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的文化景象。“关羽”与“格萨尔”的融合或许并非是简单地一种“混淆”, 而是蒙、藏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合理的“文化误读”, 也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发展形式。关羽信仰以格萨尔的文化符号出现, 获得藏民族的接纳, 而格萨尔文化吸收关羽信仰, 使得格萨尔从民间英雄形象进入了佛院殿堂, 达到互利目的, 是关羽信仰藏传佛教化和藏族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 佛教与本土宗教道教都与关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却也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文化信仰如此忠实坚定, 原因归功于中国高僧智者大师将关羽文化与佛教相融合, 再有不空大师对毗沙门天王的宣扬为关公信仰作铺垫, 最后有元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支持, 使得关羽信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时代影响巨大。一方面用熟悉的人物形象使得中国信众便与接受顺利发展佛教文化; 另一方面通过统治阶级对藏传佛教的热爱使得关公信仰借助佛教之势长盛不衰。佛教文化吸收关羽信仰, 与关公文化借助藏传佛教发展, 两者也是互惠互利, 协同发展。